

新经济对中国经济带动作用日益显现

□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近年来,中国新经济快速发展超出预期,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带动产业革命与产品创新。然而可以观察到,现有统计往往是适用于传统商业模式,并大多以法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为主要调查对象。对新产业、新业态、新型商业模式等统计有所遗漏,同样容易造成GDP的低估。

在笔者看来,近两年中国新周期与旧模式并行,新经济的蓬勃发展或在统计中被忽视,未免就新经济的统计进行修正与改进,以使数据更准确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

新经济的四个重要特征

虽然新经济一词已被广泛应用,但对其内涵仍然莫衷一是。一般认为,新经济主要指的是当前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出现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型商业模式的变化。在笔者看来,新经济主要具有如下四重特征。

一是互联网是核心基础设施。伴随着科技进步,互联网的功能已经远超信息交互的功能,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均离不开互联网作为载体,互联网已成为新经济时代核心的基础设施。例如,移动支付广泛应用的网上购物、网上物品交换、收发红包馈赠或慈善捐助等领域,都无法离开互联网的支持。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全国手机上网用户总数已达11亿户,第三方移动支付的渗透率高达90.8%。

二是数据成为核心资源。有别于石油、矿产等传统资源,产生于人类社会各种经济活动中的数据资源在新经济时期变得越来越有价值。通过记录个人的行为习惯与偏好,可以产生极强的经济效益和价值。例如,通过滴滴打车软件的使用可以分析居民出行信息,助力智慧交通;而大数据也并非孤岛,一旦做到银行、企业、消费等各种数据的共享,就可以实现人行为的充分数据化,进而判断出个人违约概率,可为个人金融贷款定价提供支持。

三是共享无处不在。与数据变成宝贵资源

类似,共享的概念虽然也早已存在,但在早前只是存在于熟人之间,并未产生较多社会经济价值。然而,由于互联网、移动技术的发展,资源共享的成本显著降低,大量的闲置资源能够通过所谓的共享经济模式被充分调动,极大地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根据《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万亿元,同比增长103%。未来几年分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GDP比重将达10%以上,到2025年攀升到20%左右。

四是产业融合已然加速。在“互联网+”浪潮的席卷之下,传统行业纷纷寻求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并尝试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例如,传统的家电行业,随着爱奇艺、小米和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的加入,与互联网的融合迅速加深,电视已不只是用于收看电视节目,而是可以随意连接家庭内部的智能设备,任意浏览网络上的资源,安装任何所需要的软件,集家庭控制中心、电脑、游戏机等越来越多的功能于一体。

新经济贡献日益明显

在新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不难发现,其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也在日益提升。

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截至2017年11月,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3.5%和11.4%,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6.9和4.8个百分点。2017年上半年,工业中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

第二,新产品的增长远远领先于传统产品。近五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保持20%的高速增长。2017年1-10月,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首次突破10万台,同比增长近70%,预计全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将突破12万台,规模约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2017年1-11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46.5%;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产量增长9.4%。2017年1-10月,太阳能电池产量增长25.3%,增速均远超传统产品。

第三,新兴服务行业快速成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对规模以上服务企业的调查结果,2017年1-10月份,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7.5%、14.9%和14.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3.8、1.2和0.9个百分点。

第四,网上零售屡创新高。2017年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增长34.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9.1%;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34.2%。而同期社会零售总额均在10%左右。阿里巴巴的“双十一”屡屡打破纪录,2017年天猫“双十一”的成交金额达到1682亿元,全天支付总笔数达到14.8亿笔,全天物流订单达8.12亿个,交易覆盖全球225个国家和地区,再创新高。

新经济的统计仍有遗漏

上述统计数据显示出新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以及在传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新经济对中国经济的提升作用,然而,在笔者看来,鉴于现有统计制度主要是建立在传统业态以及大多以法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和个体经营户为主要调查对象,对新经济的统计仍然不足,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以及GDP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一是新经济下,诸多商品和服务价值或有低估。诚如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提出,目前,许多网站向居民提供大量免费或价格非常低廉的服务,包括信息服务(商品信息、旅游信息、医疗信息)、通信服务、音乐服务等,其主要通过在线广告从企业获得收入,这使居民关于网站提供的服务的最终消费被忽略或被严重低估。例如,通过即时通讯软件,人们随时随地进行日常交流、买卖服务和工作沟通;通过导航软件,出行人自规划路线、躲避拥堵;通过视频软件,获得电视、电影节目的观看。然而,不难发现上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通常都很低甚至免费提供,原因在于商业模式的改变,通过集聚流量与口碑换取可观的广告收入、赞助等增值收入,这部分很难由现有统计口径体现。

二是共享经济让闲置资源流通的同时,也令消费者与商品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例如,当居民利用网络平台在上下班途中为他人提供“顺风车”服务,或者在度假远行

时将自己的房屋短租给他人,抑或在购物时顺便帮他人跑腿代办一些事项,从而收取相应费用,此时该居民就既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服务或商品的提供者,其用以提供服务的汽车和房屋,也兼具了消费品和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如何衡量这部份增加值,对于传统统计而言是个不小挑战。

三是新经济可能促进就业市场数据的改变。最显著的变化是,传统的以工作单位为核心的劳动雇佣关系,正在转变为以工作任务为导向的新型劳动关系。互联网平台的兴起,提高了商品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的匹配效率,缩短了二者之间的距离,各种定制化、个性化的消费升级也增加了一对一服务的需求。然而,与此同时也使得雇佣关系更加不依赖于工作单位和地点的束缚,非正式、兼职、不固定甚至临时性的工作任务越来越多,这无疑增加了就业和收入统计信息准确的难度。

四是互联网金融便捷了金融服务,但也对金融统计和监管造成了挑战。首先,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使得一些未取得牌照、没有在金融监管部门备案或者利用监管套利违规经营的行为,没有被纳入监管部门的统计和监测之中,但实际上也提供了金融服务,对传统金融服务有替代作用。其次,有些互联网金融业务与信托、银行紧密联结,抑或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各类债权不断打包分销,因此针对具体类别穿透统计的难度很大。再次,许多互联网金融公司与属地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接口尚未建立,信息的收集和汇报渠道还不畅通。此外,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创新速度极快,新产品、新模式总是层出不穷,这对监管规则的制定和更新也提出了较大的考验。

总之,在笔者看来,今年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也在去杠杆使得传统基建、房地产领域出现一定回落的同时,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起到了重要的对冲作用。然而,由于新产业、新业态、新型商业模式的发展在传统统计上难以充分体现,诸多领域如何统计方向尚不明确,可能会造成当前中国GDP的低估。尽快就新经济的统计进行修正与改进,以使得统计数据更准确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对处于新旧模式转化的中国经济而言尤为必要。

城镇化夯实三四线楼市需求基础

□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 李宇嘉

对于三四线城市来说,春节是楼市的“一扇窗”。当然,这并非单指返乡置业的规模,而是春节返乡后观察到的微观变化。颇受关注返乡置业潮,主要发生在2016年和2017年。因为,从2015年“3·30”开始(降低二套房首付、营业税免征期从5年减为2年),主要针对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全面展开。

由于热点楼市2015年率先启动新一轮回升,高房价倒逼购房需求外溢,三四线楼市全面反弹,由此催生了2016年和2017年史无前例的“返乡置业潮”。2018年,楼市政策大环境“由松转紧”,按揭贷款投放启动规模控制,1月份全国首套房贷利率同比上升21.75%。同时,“去库存”重点下沉到县域,三四线楼市政策基调已从“去库存”渐进转向“稳房价”,甚至今年春节期间还有三四线城市出台限售或收紧公积金贷款的调控政策。此外,今年棚改货币化比例将从2017年的60%大幅下降。因此,今年春节期间600多个三四线城市难现2016-2017年盛况空前的“返乡置业潮”,也在情理之中。数据显示,21个城市春节期间交易量下降30%。

笔者认为,春节并非楼市常规时期,不能代表主流需求,专业机构统计仅涵盖重点城市及周边三四线城市。因此,数据并不能代表占全国600多个三四线城市,而高基数和去库存后供应跟不上也导致数据同比不理想。近年来,除“去库存”、棚户区改造、小城镇建设等楼市政策外,据笔者研究和回乡所见,三四线城市或县城楼市基本面变化很大。

一是与大城市、所辖市县镇乡之间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近年来,不管是高铁建设、轨道交通,还是道路“村村通”,物流和电商“进村”,覆盖14亿人的基础网络将大中小城市、城乡高效链接。二是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近两年,互联网、广播电视、电商基本实现“全覆盖”,“新农合”和“新农保”让广大乡村农民实现了就医和最低生活保障,笔者老家村民基本医疗报销最高可达60%。另外,农民大规模进城,国家鼓励资本下乡,加上基础设施到位,耕地承包和规模化种植养殖已成为普遍趋势,这也增厚了农民的社会保障。三是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的面貌全面改善。近年来,公共服务“补欠账”明显倾向三四线城市及县乡镇村,借助于棚改和危房改造以及基建投资、转移支付,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地下管网、教育医疗等市政和公共设施快速跟上。

目前,三四线城市甚至是县城的面貌与中心城市的差距明显减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以来,农村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比城市居民高出1个百分点左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近10年来均下降10个百分点。收入增长、社保和公共服务改善,加上生活成本低,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有支撑。

同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三四线城市辖区内县城及乡镇农村居民的眼界拓宽了,观念更新了。作为消费升级的住房需求,必然会迅速崛起。同时,不管是农村村民,还是乡镇及县城居民,到县里或市里接受良好教育,近年来备受重视。另外,新生代农民对城市丰富而美好的生活无比向往,而近年来大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后,绝对水平已难以承受,到三四线城市购房是满足其置业梦想的选择。再加上近年来三四线城市及县城的面貌大为改观,因此,不管是大城市就人群返乡购房,或是三四线城市改善需求,还是进城购房需求,三四线楼市已经被激活。

目前,三四线楼市需求分四类,即本市居民改善型需求、返乡置业需求、辖区内居民或村民进城购房、棚改释放被动需求。近期,安居《2017-2018返乡置业报告》显示,59%的大城市受访者有返乡置业意愿,其中34%因在工地买不起房或限购而返乡置业,33%希望改善长辈和居住条件,23%希望日后回乡发展有个落脚点,仅10%是投资需求。2017年,艾普大数据与移动运营商合作,对三四线城市买房人群筛选发现,54.1%的来自三四线本地,年龄主要集中在36-45岁和46-55岁两个阶段。

可见,县乡镇村进城购房,户籍在本地而就在大城市的人群返乡是主流需求,成家生育、父母在城里为子女购房是重要驱动。三四线城市存量房整体供给效率较低,加上城镇化、农民工或就地回流驱动,已被激活的三四线楼市将持续创造需求。同时,产业内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都市圈或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大消费越来越下沉,以及分享城市化红利的诉求等,使得这些需求是可持续和有效的。

笔者认为,国家强调“租购并举”,意在让新市民能够体面地租赁,在城市稳定下来,但并不排斥他们买房的诉求,而是量力而行的“先租后买”。由于大城市高房价,回乡创业和买房也受国家鼓励,这是城镇化与房地产协调发展的过程,也是三四线城市和县城楼市健康发展的保障。

电动汽车行业发展应更注重“质”

□厦门大学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林伯强

市场通常把2007年看作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元年,因为这一年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新能源汽车的多项法规,包括《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7年本)》等,新能源汽车正式进入发改委的鼓励产业目录,为日后新能源汽车发展铺平道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刚刚经历了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当中,电动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问题和争论。其中大家讨论的最为热烈的话题是电动汽车究竟是比传统燃油汽车更环保?这个问题涉及因素较为繁杂,计算方法也各不相同,所以众说纷纭。其实,现阶段单纯比较电动汽车和传统汽车的污染排放意义并不是很大,一方面电动汽车仍在发展初期,自身技术以及中国电力结构今后必然会向更好更清洁的方向改变;另一方面电动汽车还有丰富的外延意义,这显然不是简单计算污染排放可以概括的。

不过,即使现阶段粗放地直接比较二者的

污染排放,电动汽车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也更有减排优势。根据燃油汽车最新国五标准,按照2016年国家工信部综合油耗6.56升/百公里,大致可以计算出一辆传统燃油汽车行驶排放。对于电动汽车来说,即使全部的供电来源都是火电,根据火电厂的平均污染排放来计算,相比较虽然电动汽车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略超传统燃油汽车,但是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都远小于燃油汽车。目前中国发电结构中火电比例约为73%,未来电力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清洁能源发电比例逐渐提升,以及电动汽车自身技术不断完善,电动汽车的环保优势将凸显。

电动汽车还有其他外延意义。首先,电动汽车发展后,污染物的排放存在着明显的地区转移。比如氮氧化物的排放,从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转移向了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其他地区,从而降低了污染的治理成本。其次,电动汽车替代传统汽车实际上是将污染物分散管理转化成集约化治理的过程。传统燃油汽车的污染源是一辆辆分散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车,无论是约束还是治理,难度都很大。而电动汽车则是将分散的

逐渐减少甚至取消电动汽车消费端的补贴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大额消费端补贴必要性逐渐减弱,二是消费端补贴会对电动汽车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补贴必要性减弱主要有两点原因。

随着电动车成本的不断下降,从整个使用周期来看,电动汽车的成本劣势已经不明显。

即使在目前低油价的情况下,电动汽车的成本劣势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消费端补贴的边际效应逐步减弱。

以“软价值系数”衡量美好生活需要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软价值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张海冰

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指标体系,一个关键问题是衡量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笔者认为,“软价值系数”是衡量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指标。

软价值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说过,“随着人类的文明的提高,随着人类的智力的发达,人类的欲望就很快地变得更为精细和更为多种多样”。这里所谓的“更为精细”和“多种多样”的需要,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如果说,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主要靠商品的硬价值;那么,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则更多地要靠软价值。当人们穿着名牌服装出席重要场合时,感到的自信、尊严和自我价值提升,是因为品牌软价值;当人们端起茅台酒,是在享受茅台国酒所承载的品质和文化软价值;奔驰汽车之所以在高端市场畅销不衰,原因正如其前总设计师所说,“我们卖的不是汽车,而是一件艺术品,只是碰巧它会跑。”

除了这些包含软价值的硬产品,还有大量以软价值为主的软产品,诸如电影、戏剧、电子游戏;又如软件、专利和创意;再如各种金融产品,等等。它们在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同时,也在帮助人们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软产品生产的特点是,以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主要价

值来源,形成软价值,而不是以加工自然资源为主要价值来源,形成硬价值。一件商品蕴含的软价值越多,其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就越强;一个经济体创造的软价值越多,这个经济体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程度就越高。

衡量制造业的商品软价值系数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在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而且正在越来越多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传统制造业的价值主体是硬价值,主要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现代先进制造业的价值主体越来越多地是软价值。软价值占商品总价值的比重,叫做“商品软价值系数”。商品软价值系数越高,说明产品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越高。

越是富含审美因素、时尚元素、技术含量,或带给消费者更多基本功能以外的精神满足的产品,其商品软价值系数越高。当一个制造业的商品软价值系数超过50%时,我们就称之为软性制造。

十年前,尽管诺基亚、摩托罗拉在通话质量、耐久性、成本等硬指标方面,都占据了绝对的优

势地位,但它们的价值主体是硬价值。乔布斯推出的苹果手机,不仅是通话工具,而且蕴含了更多的体验、品位、审美和时尚元素,更好地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很快就后来居上。

由此可见,进入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制造业单靠质量过硬、功能完备、价格低廉,已经不能满足审美、社交、自我认同等美好生活需

要;那些商品软价值系数较高,蕴含更多软价值,更能满足精神层面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占据了越来越高端以至越来越广阔的市场。

中国制造业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就应当不断提升“商品软价值系数”。

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社会软价值系数

随着经济发展,那些主要不是通过加工自然资源来创造价值,而是以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价值创造源泉,以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要为主要目的的产业,如知识产业、文化娱乐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产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等软产业,在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占比变得越来越高。我们将这五大软产业占GDP的比重称为社会软价值系数,作为衡量一个经济体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能力的主要指标,其公式为:社会软价值系数=软产业增加值/GDP。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工业社会后期,硬产业的比重逐渐下降,软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

美国社会软价值系数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这个过程:从1970年的61.2%,上升到2010年的78.8%,平均每十年上升5个百分点。

从欧洲和日本等国家的情况看,社会软价值系数也是反映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质量和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程度的重要经济指标。日本从1994年到2014年,社会软价值系数上升了近十个百分点;英国的社会软价值系数上升速度略高于日本,从1990年的67%,上升到2009年的79%。

从上述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社会软价值系数在接近80%左右时就处于基本稳定、小幅

波动的状态,我们称之为后工业社会软硬价值的“八二定律”。

中国社会软价值系数变化的三个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软价值系数变化分为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4年的34%上升到2001年的41%,短短六年内提高了七个百分点,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快速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第二个阶段,从2001年到2011年,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社会软价值系数却增长较慢,十年时间只提高了三个百分点。第三个阶段,从2012年至今,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社会软价值系数快速增长,在短短五年之内就提升了八个百分点,突破50%,达到52%。这种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力度和速度,即使在全球范围之内也是十分罕见的。

2015年,中国社会软价值系数跨过50%的分界线,2017年达到52%。我们建议,适时提出中国经济社会软价值系数目标:到2025年,社会软价值系数提升到60%;到2035年,社会软价值系数提升到70%;到2050年,社会软价值系数提升到80%。

在过去几十年快速工业化阶段,我们曾经用GDP增速作为主要发展目标,用恩格尔系数衡量经济结构变化。在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时代,提出并发展商品软价值系数、社会软价值系数等新的经济指标,建立与之相关的社会发展和政策考评体系,对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

笔者认为,国家强调“租购并举”,意在让新市民能够体面地租赁,在城市稳定下来,但并不排斥他们买房的诉求,而是量力而行的“先租后买”。由于大城市高房价,回乡创业和买房也受国家鼓励,这是城镇化与房地产协调发展的过程,也是三四线城市和县城楼市健康发展的保障。